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

吕世生
等 编著

汉语 新词 英语 译概 览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

汉语新词语英译概览

吕世生 滕建辉 编著
周健 刘甜 马丽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新词语英译概览 / 吕世生等编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7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
ISBN 978 -7-310-03895-4

I. ①汉… II. ①吕… III. ①汉语—新词语—英语—
翻译—研究 IV. ①H136②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433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8 印张 2 插页 396 千字

定价:5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总 序

对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存在，有两个影响甚大的宿命预言：一个是《旧约》的“巴别塔”说，一个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

“巴别塔”之说谓：大洪水过后，诺亚的子孙逐渐遍布天下，他们都讲一样的语言，文化亦无隔阂。他们一度对上帝有所怀疑，便决心合力建一座塔，塔顶通天，以显示自己的力量。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不允许人类怀疑自己的权威，就改变并区别开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协力，高塔也就中途停工。这一宗教传说颇有象征意味。除它揭示出语言对于文化交流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更借“上帝意志”作借口对人类文化隔阂无法打破的宿命预判。

亨廷顿则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是无法避免的。这种乌鸦嘴式的预言当然是不受欢迎的，但进入 21 世纪后，事态的发展却好像在为他做着背书。

但是，宿命真的是无法改变的吗？已经能遨游太空的人类对于文化困境真的只能束手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两个预言讲出了重要的事实，但是，讲出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事实的全部是：人类的文明史始终是在文化隔阂与文化交流的双向过程中前行，同样也是在文明冲突与文明交融的双向过程中

前行的。

梁启超曾综括华夏文明的历史，指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跨文化交流”始终是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重要契机：“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他还预言20世纪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婚之时代”，而“彼西方美女，必能为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其实，推而广之，异质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史普遍的现象，其积极作用也如同在华夏文明史上一样。

时至今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完全地闭关锁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地球村”中，文化的接触、交流只能是越来越频繁。对此，主动地参与，积极地推动其良性发展，既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的责任，也是地球村每位“村民”的义务与责任。在这方面，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无疑是一项影响广远的创举。南开大学不仅是美洲大陆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合作伙伴，而且是国家汉办“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与培训基地。基地整合南开大学各有关学科的学术力量，一方面培训师资，为全球孔子学院提供服务与支撑，一方面围绕“跨文化交流”开展学术研究。这套丛书就是基地同仁们研究的成果。

中华古老的经典《周易》讲得好：“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君子以同而异”。承认差异，积极沟通，保持、产生勃勃的生机——古人尚且能认识，我们只应比古人做得更好。

当然，差异是永恒的，“天堑变通途”、“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可能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但美好的理想给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它不能抵达，它却可以趋近。正如同“通天塔”永远不能抵达神秘的苍冥，但多垒的每一石、每一砖却都能使我们更靠近那璀璨的穹庐。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为跨文化交流作出毕生努力的叶嘉莹先生日前填词《水龙吟》云：“正学宏开，东西互鉴……待如

椽健笔，长虹绘写，架茫茫海。”范曾教授唱和曰：“且追随精卫，衔枝填取，莽苍苍海。”这也正是南开同仁们共同的宏愿。

为此，我们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编写了这一套小书；为此，我们将持续编下去，并努力编得越来越好。

陈 洪

2012 年 6 月

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全面网络化和日益国际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令人快活、令人劳累又令人烦恼的时代。信息化导致海量的信息大流通，人们获取知识、传播观点从来没有如此方便快捷。网络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谈话、写作、学习、休闲甚至整个生活方式。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让地球迅速变小，让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越加频繁深入。

于是，大量新词语不断涌现出来。有些是率先见诸于互联网上，一个个网络新词汇闯入人们的语言。有些是某个地方性方言词汇，瞬间进入主流词语。有些新词新语由权威人士率先创造使用，立刻引来无数跟踪和效仿。有些则来自外来语，经过汉化，甚至有时加上本土化的作料，成为中国人的热门词汇。

新词语代表了文化上的一种创新和求变，在丰富人们的词汇，让人们的表达更加生动活泼的同时，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因此，新词语常常大行其道，占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似乎没有新词语的文章就代表着落伍和衰退，不采用新词语的讲话相对而言就显得有些乏味。

新词语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翻译成准确传神的外文！

当然，说到外文，首先是英文。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成英文呢？第一是这些新词语出现的高频率。新词语进入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后，常常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组成部分，译员当然要翻译。第二是新词语鲜明的时代性。新词语涉及的往往是人们今天的生活范畴，而“今

天的故事”最需要对外讲述，也是外国人最为关注的内容。第三是新词语的生动特点。新词语之所以进入人们的语言，是因为它们生动鲜活的特点，特别是其背后的来源故事，而这使新词语本身成为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

新词语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怎么到了翻译环节就成为了“棘手的问题”呢？至少也有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新词语出现后，需要一个消化和被熟练掌握和使用的过程。特别是新词语隐喻的含义和背景，翻译需要一个理解和准确把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一种文化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快速反应。

其次，新词语的一个特点是这些新的表达方式还在演变之中，还需要了解更丰富的元素和使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准确地固定其意。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新词语所包含的元素也在发生变化，这使得新词语的翻译常常成为一个正在进行中、而不是完成了的工作。

最后，新词语的翻译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新词语的复杂来源使得字对字的翻译成为不可能，而它们的英译往往需要求助于解释、说明、借用等多种方式，方能比较准确地传达其真实含意。

《汉语新词语英译概览》比较好地解决了上面的三个难题。编者没有一味地赶时髦，所收录的词语是2006年至2010年间涌现出来的，都经过了至少一年的实践和考验，基本有了确切的含义和比较稳定的使用率。

针对第二个难题，编者给收录的每一个词语都提供了翔实的新义介绍，即让每个新词语都具备了明确的定义。在此基础上，翻译成英文，有的还提供了不止一种译文。

为了完成跨文化传播这个最为重要的翻译环节，编者采用寻找英文对应表达方式、意译和音译等多种手段和技巧，力求为每一个新词提供一个最能表达其文化背景和含义的英文说法。

新词语的翻译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边翻译边探索边创新的工作，可谓光荣而艰巨。编者知难而进，为我们

呈现了这本收词最多、解释最为充分、翻译最为全面准确的词典。

新词语翻译的性质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工程。《汉语新词语英译概览》首版面世的时刻，必然是修订和充实的开始。我们所处时代的信息化、网络化和国际化的特点决定了更新和完善将是编者们的下一个目标。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1 年 11 月

前 言

本书收录的汉语新词语定义是，新近出现的在一定范围内较为流行的汉语词汇、词组或短语。该定义包括三个含义：（1）词语出现的时间段；（2）词语来源；（3）词频高低。关于第一点，词语出现的时间段大致划定在 2006 年至 2010 年这一期间。这一时间段与近年国家语委发布的汉语新词语的时间标准不同，国家语委发布的汉语新词语时间段均设定为一年。我们如此划分主要考虑本书的使用对象以及本书的跨文化交流特征。本书的使用者主要为汉语学习者、汉学学者以及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其他人员，对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可能具有参考价值。这些读者往往密切跟踪汉语、汉文化在一定时间段上的变化，“时效”的适当延伸对他们而言如同“时效”本身一样非常重要。他们既要关注新词语的“共时”发展，也要研究新词语的“历时”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收录的汉语新词语英译具有跨文化传播特征，客观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因此我们所划定的时间段只是如实反映了这种客观现实。

关于第二点，本书的新词语来源包括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策划的近几年的汉语新词语编年本、国家语委公布的汉语年度新词语、汉语新词语词典、网络流行语等。这种做法表明我们认同上述新词语选定结果，同时我们不必重复新词语选取前期大量的机械筛选过程，提高了本书的编写速度。然而，前述新词语由于时间段设定为一年，因此当年的高词频词语往往被选定为新词语，而稍后这些新词语则又鲜有提及，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现了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一些词

语，而后却在各种媒体上迅速消失。因此，我们从上述来源中删除了这类词语。

词频是新词语的重要属性，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汉语年度新词语均经过科学的词频统计，本书的新词语主要源于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审定的新词语，因此无需重复这一统计过程。但是，由于词频与词语流行时间长度相关，当我们的新词语设定时间长度增加 4 倍之后，前述新词语词频统计结果将发生变化。为补偿这种变化，我们采用人工问卷方式作词频调查。问卷设计把 2006 年至 2010 年收集到的新词语列表，标注熟悉与不熟悉两个选项。收回问卷 282 份，南开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 162 份，信息学院研究生 86 份，相关专业教师与管理人員 34 份，最终以每个词语“熟悉”选项的数量多寡降序排列，前 360 个词语收入本书详细解释的汉语新词语范围。

新词语的确定是本书编写的第一步，下一步是更为困难的翻译。

本书新词语的翻译始于相应译文的检索，有相当一部分新词语都可检索到相应译文。随后编著者逐个审核其意义的准确性及在英语中的可接受性。凡不理想的译文，均提出新的译文。之后编著者集体讨论所有译文，对有争议的译文交由专家审校，并由专家审读全部译文。专家包括联合国现职翻译、南开大学任教的英语为母语的教师。但由于汉语新词语翻译的特征，本书中有争议的译文仍然存在。多数情况下，本书给出了一种译法，个别时候给出了两种甚至三种译法。这既是新词语翻译复杂性的反映，也是词语运用的语境依赖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本书给出的新词语译文仅具参考价值。

目前的汉语新词语翻译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的译文，这常归因于文化的差异。虽然有些新词语获得了较好的翻译，但另一些则似乎是勉力为之。总之，大多数都难以达到原词语语义和文化含义基本完整地传递到英语中的理想状态。从跨文化交流视角观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它受制于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阶段，翻译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一特定历史阶段某些新词语不能取得理想的翻译效果，

但随着跨文化交流的进展，它们一定能取得理想的翻译效果。无数词语翻译实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翻译不仅受制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也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促进力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新词语的翻译往往不理想，但其总的趋势则是推动了跨文化交流发展，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编写体例

每个新词语的词条包括词目、原义、新义、例句、翻译、翻译说明、相关词语翻译、合成词翻译。

1. 词目：收词包括新造词、旧词新用和外来词。

2. 原义：尽可能简洁地解释立目词条的含义。有多个义项的，分别标注①、②等符号。对于新造词和外来词，因其没有“原义”，故略去“原义”；对于旧词新用（由原有词语语义变迁形成的词语），则列出“原义”。

3. 新义：尽可能简洁地解释立目词条的含义。有多个义项的，分别标注①、②等符号。对于新造词和外来语，只列出“新义”。对于旧词新义，列出“新义”，以对比新旧意义的演变。对于所有三类汉语新词语，均在“新义”后附例句。

4. 翻译：列出汉语新词语的译文，多个意思相似的译法，用分号隔开；对于新词语不同义项的译法，标注①、②等符号并用分号隔开；对于已列入专有名词的新词语，译文采取大写形式。必要时对译法给出具体的解释。

5. 相关词语翻译：列出与词目相关的汉语新词语词目、意义和翻译。

6. 合成词翻译：列出由词目构成的合成词词目、含义和翻译。

关于“汉语新词语英译附表”

本书正文收录的是 2006 年至 2010 年间词频最高的、从翻译视角看具有代表性的新词语。由于本书意在促进跨文化交流，其工具价值同等重要。显然正文收录的新词语数量与其工具价值无法匹配，为弥补这一缺憾，故将词频稍低的新词语也收录在内。“汉语新词语英译附表”中的新词语来源和时间段与正文词条相同，但词频低于正文的词条。

绪 论

汉语新词语主要有三种类型：新近一段时间生成的词语、原有词语语义变迁形成的词语以及外来语。外来语是反映其他文化的概念进入中国文化的词语表达。新生成的词语和“旧词新义”机制形成的词语通常是中国社会的新事物、新现象的词语化。这类新词语中很多词语的语义系由隐喻认知机制生成，这种机制生成的语义多体现为文化语义。文化语义是这类新词语的本质特征，对于这种特征当前的新词语翻译研究未能给予足够重视。

当前的新词语翻译研究主要关注概念意义的对等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两个层面的问题。概念意义的讨论主要基于“对等”研究范式，而由于目前这一范式缺乏合适的理论模式解释新词语翻译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的研究往往各话自说。（季绍斌，2004；邵星，2003；杨京宁，王琪，2003；杨全红，2003；张健，2001）针对这一问题，新词语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文化问题。首先，新词语的本质特征是文化语义，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之上的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具有多种选择性，其选择性具有文化倾向性。不同文化语境下或可存在类似的概念，但其词语表征方式、概念意象通常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形新词语翻译研究无法规避。其次，新词语语义生成机制是隐喻认知，文化因素决定源域（已知的或具体的概念）及其属性特征选择，进而决定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未知的或抽象的概念）的结果。文化是影响文化语义生成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的研究似乎忽略了文化之于新词语语义的这种普遍联系。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意义的生成机制，由此

揭示了意义生成的普遍规律。这对新词语文化语义的生成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本书拟以隐喻认知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新词语文化语义的隐喻认知机制,进而探索新词语翻译与隐喻认知的普遍联系,使新词语翻译的文化诉求得到充分表述。

一、新词语语义特征及语义生成模式

新词语是社会文化现实的直接反映,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新词语产生的渊源,其生成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反映在语义上就是其文化语义特征十分突出,文化语义是新词语生成并得以流行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词语的文化语义,王德春的定义是:“文化语义是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语言的国家的历史和民族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是说,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①(1998: 1)。陈建民则认为文化语义是“通过联想而产生的附加意义”(1999: 19)。上述两个定义的共同点即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的联想意义。^②

认知语义学则进一步阐明了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两者之间的联系,声称文化语义的生成机制是隐喻认知。文化语义是在其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文化模式作用下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概念范畴中的某些属性突显而形成的转义。(张再红, 2009: 1)

根据认知语义学,一个事物具有多种属性,词语的概念意义只反映其本质的主要属性,其他属性作为潜在的语义特征储存在语义中。在特定的语境下,某些潜在的属性被激活,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形成词语的联想意义。(张再红, 2009: 108)按照利奇的观点,联

① 王德春使用的术语是“民俗语义”,现多用“文化语义”代替,本书使用后者。

② 在此使用利奇划分的不同类型的意义术语,其中2~6种意义类型统称为联想意义,分属于文化语义的不同类型(参见李瑞华等译利奇的《语义学》,第18~33页)。鉴于国内学界多用“概念意义”这一术语,本书用“概念意义”替换利奇的“理性意义”。

想意义就是文化语义的具体体现（本书关于文化语义的讨论基于这一理解^①）。（李瑞华，1987：25）认知语义学的这种解释表明，词语潜在属性激活过程是一种文化模式导向过程。在不同文化模式的作用下，词语潜在属性选择的文化倾向性十分明显，文化语义的生成取决于文化模式。

关于文化模式，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定义。D'Andrade 从认知视角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间所共享的认知图式”（1989：809, 823）。Gee 基于原型论的定义是：人们的习惯性直觉，依据民族或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一种看法（1999：68-70）。这一定义将文化模式归结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简单的典型的看法，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则是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各种理解和假设的相对固定的集合。

文化模式创造隐喻，决定隐喻的属性特征选择，同时也是隐喻的知识渊源和建构的基础。一种文化的核心观念，如价值观、世界观等，通常借助隐喻表达。文化模式既是概念意义扩展的基础，又是词义理据的来源。（Quinn N. 等，1987：28）

隐喻是重要的认知机制（Lakoff & Johnson，283）。隐喻是利用已知的、具体的事物理解未知的、抽象的事物的认知过程。基于二者的相似性，隐喻将前者（源域）的某些概念属性映射到后者（目标域），从而在已知和未知的两个概念间建立起联系。如“婚姻是城堡”这一隐喻，即是将城堡（源域）的某些属性特征，如禁锢、约束等，映射到婚姻这一目标域，使后者具有与前者类似的属性特征。隐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规律，但在隐喻过程中，人们受制于文化模式。就新词语的文化语义而言，文化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词语的语音隐喻和词汇隐喻两个方面。利用语音的相似性生成新词语是常见情形，如“韩流”、“面了”、“半糖夫妻”、“海归”、“负翁”、“美眉”、“铁的”、“晒”、

① 关于文化语义的界定学界尚有争论，请参见魏春木（1993）、苏新春（1995）等人的研究。

“黑客”等词即属于这一类型。“韩流”是近年较为流行的新词语，意指具有韩国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韩国娱乐产品一段时期内在我国较为流行的一种现象。该词语语音与气象学名词“寒流”构成谐音。“寒流”的属性特征之一是，一段时间内某一地区的主导气候特征，流行是其属性概念之一。这一特征借助语音与韩国文化娱乐产品、生活方式在我国流行的现象产生联系。“韩流”即是利用语音隐喻生成的新词语。另一典型情形是“面了”一词的隐喻过程。“面”在北方方言中喻指人的性格如“面团”一样，软弱无能，“面了”一词取此谐音隐喻大学毕业生求职工作中毫无自主性、任人摆布的状态。外来语音译成为汉语新词语是语音隐喻生成新词语的另一重要来源。汉语新词语“晒”是英语“share”的音译。“晒”的概念意义是把东西放置于阳光下，联想意义有分享、曝露、展示、把相关信息放到网上等，往往含有炫耀之意。英语“share”的概念意义是接受（经验）、分享、参与等，它没有上述汉语的联想意义。汉语利用语音的相似性生成了“晒”这一新词语。可以看出，语音隐喻也是汉语新词语生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另一种重要方式是词汇层面的隐喻，这是更为常见的方式。下述新词语都属于这一类型，如“菜鸟”、“山寨”、“潜水”，等等。以“菜鸟”一词为例，该词源于台湾方言，指刚刚学会飞行、飞行中经常掉落地上的小鸟，后泛指初涉某一领域特别是电脑网络领域的新手。“潜水”一词属于常用语，其文化语义是指匿名上网或隐身登陆却不发表言论，用人们熟知的潜水活动隐喻这种行为。这些都是典型的词汇层面隐喻认知形成的新词语。

从上述新词语语义生成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化模式作用下，词语的概念意义扩展，体现为文化语义。文化语义是某些新词语的本质特征，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新词语的跨文化交流。